

放弃核计划的内源力分析

——以南非和利比亚为例

张 春

内容提要 学术界目前对与核扩散同样重大的放弃核计划缺乏充分的研究，往往强调安全、国内政治、规范及强制外交 4个方面中的某一个或多个，缺乏综合的分析框架。笔者提出“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的理论模式，认为尽管外部压力对一国放弃核计划有相当重大的影响，但国内政治动力仍是决定性的。对南非和利比亚的案例分析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无论南非还是利比亚，安全威胁的影响都不大，但包括规范与强制外交的外部压力影响较大，并对决定性的国内政治动力有促进作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当前的核扩散危机也同样有效，能为其得到缓解甚至彻底解决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 核计划 外部压力 内部动力 南非 利比亚

作者简介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040）。

2006年10月10日，伊朗发表声明，坚决不放弃核计划的实施。几乎所有人都在聚焦于日益严重的核扩散及效力日益下降的核不扩散机制等问题时，却少有人对历史上多起成功的放弃核计划、甚至是销毁核武器的案例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反思。到目前为止，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国家宣布永久性地终止其本已具有相当基础的核计划，其中南非甚至拆除了其所制造的6枚核武器。当我们将这一现象与当前相当热门的核扩散问题相联系进行思考时，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解决当前危机的思路，而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

文献回顾与分析模式

本文旨在试图提出一种理论模式，可用于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在核计划已经取得发展、甚至制造出核武器之后会放弃核计划。本文将“放弃核计划”定义为，一国政府以官方形式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其核武器计

划的行为。¹ 具体而言，这有两个标准，即该国曾积极发展核武器，排除一切争议、只考虑获得核武器；后来又以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了核计划。

有两位学者曾根据一国对发展核武器的兴趣及实施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0”表示一国对获取核武器没有兴趣，“1”表示它开始允许讨论该项选择，“2”则表现出积极发展核武器的明确政治决策，“3”表示一国开始了第一次核爆炸或获得了第一枚核武器。^④ 根据这样的划分，一国放弃核计划应当至少发展到了“2”的

¹ 需要指出的是，“放弃核计划”不同于有的学者所称的“撤消核计划”（nuclear reversal），后者是指“放缓或停止一项官方核武器计划的政府决定”，它显然比本文所讨论的放弃核计划要宽泛，后者还包括本文所不讨论的放缓、但可能恢复的行为。

^④ See Sonali Singh and Christopher R. Way, “The Correlat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 A Quantitative T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6, 2004, pp. 865–867.

阶段, 然后重新回到“0”阶段。¹ 这样, 到目前为止, 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就有8个: 韩国(1979年)、阿根廷(1991年)、巴西(1991年)、白俄罗斯(1992年)、南非(1994年)、哈萨克斯坦(1995年)、乌克兰(1996年)及利比亚(2003年)。

就其数量而言, 放弃核计划显然是一个重要现象。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相当缺乏, 尽管可能对于单个的国家放弃核计划有一定的研究。但这些案例似的研究由于较为分散, 涉及大量的变量, 因此并未形成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框架。而且目前的学术研究往往假设, 如果理解了一国采取核扩散政策、启动核计划的原因, 就能找到促使其放弃核计划的解决方法。因此目前有关放弃核计划的研究大多是与对导致核扩散原因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就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而言, 斯科特·萨甘(Scott Sagan)所作的研究或许最为全面。他将核扩散与放弃核计划结合在一起研究, 提出了3个模式——安全模式、国内政治模式和规范模式。安全模式假定, 一国寻求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国家安全; 一国发展核武器是因为其意识到存在来自敌对国家的威胁,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因此, 一旦该国认为其面临的威胁大大下降甚至消失, 放弃核计划便成为可能。国内政治模式, 即国内的特殊个人和团体——主要包括核武器研究人员、军队和政客, 出于种种原因支持发展核武器。据此, 一国放弃核计划的原因即这些特殊个人和团体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或权势地位下降。规范模式, 也可称为声望模式, 萨甘认为核武器可作为一国国际声望的重要象征, 一国追求核武器极可能是出于对国际声望的渴望。因此, 反对核扩散的国际规范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 对于一国放弃核计划来说可能是重要的。^④

米歇尔·莱斯(Mitchell Reiss)也是一位长期研究核扩散与放弃核计划的学者, 其1995年完成的著作可能是第一本将放弃核计划当做一般性概念加以研究的著作。该书提供了有关放弃核计划的较为详细的案例研究, 他对放弃核计划的原因讨论得相当全面, 涉及冷战终结、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民主化、特定个人等多种因素, 但其

理论框架并不明确。2004年, 莱斯又和其他学者一道主编了另一本关于放弃核计划的著作, 风格上并无太大变化, 也并未提出明确的理论框架。^(四)

除上述两项总体性的研究之外, 还存在两种研究模式, 事实上分别强调了萨甘的安全模式和国内政治模式。如泰扎·保罗(Thazha V. Paul)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萨甘的安全模式相符,^{1/4} 而埃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则更强调国内政治模式, 认为国内游说团体与政府采取的经济自由化决策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1/2} 此外, 也有人尝试使用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作为研究一国放弃核计划的主要解释模式。布鲁斯·简特森(Bruce W. Jentleson)和克里斯托弗·威托克(Christopher A. Whytock)对于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研究就是典型。^{3/4}

上述研究事实上涉及放弃核计划的4个层面的因素, 即安全、国内政治、规范和强制外交, 但大多都分裂地、未能形成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结合上述文献, 将影响放弃核计划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 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笔者认为, “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或许是更为全面的解释一国放弃核计划的理论框架。辩证唯物主义历来强调, 尽管外因的影响很大, 但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就一国作出发展或放

¹ 有学者将这个点称为一国核计划从发展到终止的“转折点”(tipping point)。See Kurt M. Campbell, Robert J. Einhorn, and Mitchell Reiss eds., *The Nuclear Tipping Point: Why States Reconsider Their Nuclear Choic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④ See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1997.

^(四) See Mitchell Reiss, *Bridled Ambition - Why Countries Curtail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Press, 1995; Campbell, Einhorn, and Reiss eds., op. cit.

^{1/4} See T. V. Paul, *Power Versus Prudence - Why Nations Forgo Nuclear Weapons*, Montreal: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See Etel Soling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estrai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3/4} See Bruce W. Jentleson and Christopher A. Whytock, “Who ‘Won’ Libya? The Force-Diplomacy Deb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2006.

弃核计划的决策而言,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内部因素,尽管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具体而言,在3种外部因素——安全、规范及强制外交中,安全往往是一国发展核武器的借口,但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一定会导致放弃核计划;以规范和强制外交为主的外部制裁与孤立,在不危及发展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条件下,极可能促成一国放弃核计划。相比之下,某种程度上由外部压力而加剧的国内政治考虑,如一国对外部压力的认识、国内政治斗争、利益集团等,才是决定一国放弃核计划的真正动力。

上述观点可以简化为3个相互联系的假设:

(1) 如果一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下降甚至消失,该国可能放弃核计划; (2) 在一国安全威胁下降甚至消失的同时,如同存在相当大的强制外交与规范的压力,那么该国放弃核计划的可能性将会显著上升; (3) 在外部压力影响下加剧的国内争论如果相当激烈、甚至对现政权构成威胁时,该国将放弃核计划。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以南非和利比亚作为案例加以分析,原因有二:第一,这两个国家放弃核计划的过程相当迅速,从决定放弃核计划到执行彻底的放弃,再到向国际监督机构开放核设施,并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南非用了不到两年时间,而利比亚甚至不到一年。第二,无论是南非还是利比亚,事实上启动核计划与放弃核计划的决策者都是相同的。就南非而言,尽管其间经历了几届政府,但整个时期都由国民党统治;而利比亚则一直由卡扎菲领导。

案例研究之一:南非

1989年9月,弗雷德里克·威廉姆·德克勒克当选为南非总统后仅两个星期,便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接受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11月,该委员会建议完全拆除并终止核武器计划。于是,德克勒克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制定拆除核武器和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时间表。1990年2月1日,南非建于1978年的铀浓缩工厂关闭。2月26日,德克勒克签署了终止核武器计划并拆除所有现有核武器的命令。这项工作于1991年7月正式完成。南非于同月加入核不扩

散条约,并于两个月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了安全协定。1993年3月,德克勒克在国会宣布,政府已经拆除其所制造的所有6.5枚核武器。¹由此,南非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已拥有核武器但又自愿拆除的国家,其缘由是什么?让我们利用上述的分析框架加以分析。

(一) 南非是否出于安全威胁而发展核武器的?而在南非放弃核武器时是否意味着这种安全威胁已经减少,甚至已经消失

南非核武器计划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南非勘探出世界上第三大铀矿藏;但此后一段时间该国并未认真考虑发展核计划。南非官方决定开发核武器是在1978年,在1974年建立的铀浓缩工厂的基础上,南非于1978年开始生产高浓缩铀。1979年南非生产出第一枚核武器,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国总共有6枚核武器。^④

南非发展核武器有其安全考虑。有学者认为,“像以色列一样,南非受到敌对邻居的孤立和威胁,南非不得不与之斗争,以捍卫作为一个国家的完全生存。获得核弹是一种明确威慑他国任何将来军事入侵的方法……”^(⑤)这种威胁更多来自于想象的社会主义在南非邻国的扩张,如前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扩张势头、几万名古巴军人进入安哥拉等。但安全因素既不是南非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南非放弃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原因。南非起初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是和平使用,因此“核弹的设计和运行考虑都没有与南非军方协商,诸如大小和重量没有被考虑。”^⑥福斯特总理于1978年批准的南非核战略分三步走:

¹ 南非当时的第七枚核武器并未完全生产出来。有关南非核政策变化的历史分析,参见赵恒:《南非核政策的历史透析》,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第49~52页。2006年11月27日,南非矿业与能源部部长声明,南非将启动核能计划,这是否代表了南非核计划的反复,还有待进一步考察。See Linda Ensor “South Africa SA Poised to Embark On Nuclear Route for Power”, *Business Day* (Johannesburg), November 28, 2006.

^④ See Darryl Hewlett and John Simpson “Nuclearization and De-Nuclearization in South Africa”, *Survival*, Vol 35 No 3 1993, p. 160.

^(⑤) Roger Mokander and Robbie Nichols *Who Will Stop the Bomb? A Primer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5 p. 161. 转引自赵恒:前引文,第51页。

^⑥ Scott D. Sagan op. cit., p. 70.

第一阶段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政府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拥有了核武器。第二阶段，政府将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揭示其核能力，从而得到这些国家的秘密承认。第三阶段，向全世界宣布南非的核能力，不管是用公开声明还是公开试验的方式。¹但事实上南非的核战略一直都处于第一阶段，可见安全威胁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尽管到南非放弃核计划时，诸如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邻国的政权的下台、古巴军队的撤走、纳米比亚的独立、苏联解体等事件的发生，可能极大地缓解了南非的安全威胁，但其影响也并非根本性的。尤其是，由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而来的各种国际制裁与孤立依然如故，尽管这些制裁与孤立并不带来对南非的安全威胁。

(二) 不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国际制裁与孤立是否促使南非决定放弃核计划

应当承认，这一因素远比安全考虑显得重要。由于国内种族隔离政策，南非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益遭到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随着1960年“沙佩维尔(Sharpeville)惨案”中67名黑人被枪杀，南非被迫于1961年退出英联邦。1963年，英、美两国开始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1964年，国际社会决定停购南非黄金、停止向南非供应石油。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的决议。此后，南非日益被各种国际组织开除。1974年联合国大会中止了南非与会的资格。到1988年底，与南非建交的国家只有22个，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弃儿”^④。因此，期望解除外部世界的制裁与孤立，成为南非放弃核计划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此外，来自世界范围的外交孤立及文化、商业和其他民间联系的切断导致了安全威胁的夸张想象，且导致出现了国家面临“全面冲击”(total onslaught)的认识。^⑤到德克勒克决定放弃核计划时，尽管种族隔离是问题的核心，但他也认识到，核武器将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成为南非的负担，有无核武器已经不再重要。^⑥因此，在迈向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改革既存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核武器似乎是未来与西方及其他国家取得良好关系的一个阻碍。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南非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与核武器而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或者继续与西方的艰难关系。这样，放弃

核计划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压力有关，却是植根于更大的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内政治背景之中。^⑦

(三) 在不安全的威胁下降、但外部压力仍相当大的情况下，国内政治考虑是否成为南非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性因素

显然，国内政治因素在南非放弃核计划中的决定性毋庸置疑。到20世纪80年代末，种种迹象表明，南非白人已经很难再维持种族隔离制度，黑人掌握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德克勒克认识到，南非的白人统治终将结束；南非正处于十字路口，局势将会演变为南非白人不可能取胜的巨大内战。因此，与其维持现状，不如在尚保有相对强势地位时与黑人谈判达成一个“新交易”，这远比革命爆发时的后果要有利得多。^⑧但这与南非放弃核计划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第一，即将下台的白人政权害怕一个由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拥有核武器，这是关键。一个黑人政府继承核武器的可能性让人不安，那将带来非常真实的“黑弹”(black bomb)的可能。^⑨因此，必须“避免任何核武器与核材料可能落入占人口多数的黑人之手”^⑩。白人政权担心，黑人掌握核武器、核材料与核技术后，不但可能向

¹ See Mitchell Reiss, op. cit., pp. 15-16. 转引自赵恒：前引文，第51页。

^④ 余建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兴废》，载《史林》1997年第2期，第99页。

^⑤ See Robert Scott Jaster, *The Defence of White Power - South Afri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Pressure*, London: Macmillan, 1987, p. 45.

^⑥ See Peter Liber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Fall 2001, p. 74. David Albright, "South Africa and the Affordable Bomb",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 50, No. 4, 1994.

^⑦ See William J. Long and Suzette R. Gilbert, "Ideas, Beliefs and Nuclear Policies: The Cases of South Africa and Ukraine",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7, No. 1, 2000, p. 32.

^⑧ See Dickson A. Mungazi, *The Last Defenders of the Laager - Ian D. Smith and F. W. de Klerk*, Westport: Praeger, 1998, pp. 143-150; John Edward Spence ed., *Change in South Africa*,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4, p. 5.

^⑨ See Reiss, *Bridled Ambition*, pp. 20-21; Liber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Bomb", p. 85.

^⑩ See Arjun Makhijani, Howard Hu and Katherine Yin, *Nuclear Wastelands: A Global Guide to Nuclear Weapo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 573. 转引自赵恒：前引文，第52页。

利比亚、古巴、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扩散，还可能将其作为与南非白人讨价还价的武器，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用来对付白人。¹

第二，为南非白人、国民党赢得国际声望。南非发展核武器本身就有这一考虑，考虑到南非领导人发现自身形单影只，获取核武器将是一个迫使世界、尤其是西方与其发生某种联系的办法，因为那可以证明“国家的生存能力”^④。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拥有核武器已经成为南非国际声望的一个污点，对改善外部关系、缓解外部压力的努力来说已不再有利。与此同时，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已经形成诸多制约。此外，非国大也反对拥有核武器，其上台后也可能放弃核计划，为自身赢得国际声望。因此，对南非国民党而言，与其拖延，不如趁早。

案例研究之二：利比亚

2003年12月19日，卡扎菲宣布利比亚放弃核计划。此后，利比亚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措施：利比亚加入了《化学武器条约》，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04年3月，利比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附加议定书，同意该机构对利比亚进行突击检查。到2004年9月，在卡扎菲宣布决定后不到一年，美国国务院宣布证实，利比亚已经“相当确切”地放弃了其核、导弹计划。^(四)

对于利比亚放弃核计划原因的探析却有诸多分析，有人认为是积极的不扩散政策的成功，有人认为是美国强制外交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杀一儆百的镇慑效果。显然，利比亚也是一个检验本文理论假设的较好案例。

(一) 利比亚发展核武器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安全考虑？而放弃核计划是否因为不安全的威胁减少，甚至已经消失

1969年卡扎菲上台后，迅速将发展核武器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据悉，利比亚于1973年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交易，由利比亚资助巴基斯坦实施该国的核计划，而后者回报以核武器技术与物资。^⑤1975年，利比亚又和前苏联签署了一项核贸易条约，得到了一个用于研究的反应堆。此外，为了获得能生产铀四氟化物——用于生产高

浓缩铀的工厂，利比亚也和两家比利时公司进行过紧张的谈判。这两家公司为前苏联提供的研究性反应堆给与了技术援助，并为铀浓缩提供了可行性研究。^⑥尽管最后双方于1984年达成一项协议，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比利时最终撕毁了该协议。^⑦

安全考虑在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的辩解中是不断被引用的借口。以色列所拥有的核能力是利比亚最经常引用的借口；而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位于奥西拉克(Osirik)的核反应堆实施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进一步增强了利比亚获得核武器的决心。^⑧除以色列外，美国也是利比亚所认定的威胁来源之一，这不仅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打压，还在于美国在地中海锡尔特湾的军事存在。应当承认，到2003年利比亚放弃核计划时，以色列并未放弃其核能力，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是减弱、反而是加强了，因此，安全显然并非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在美国发动起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之下，利比亚从事恐怖活动的历史及其核计划极可能使其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九)从安全角度看，某种程度上利比亚的安全环境是恶化、而非改善了。

(二) 国际制裁与孤立是否促使利比亚决定

¹ See Frank V. Pabian, "South Afric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Lessons for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3, No 1, 1995.

^④ Stephen M. Meyer, *The Dynam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55.

^(四) See Paula A. DeSutter, "Completion of Verification Work in Libya",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Nonproliferation and Human Rights, September 22, 2004, <http://www.state.gov/t/vci/rls/m/2004/37220.htm>.

^⑤ See Leonard S. Spector and Jacqueline R. Smith, *Nuclear Ambitions: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1989-199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 175-176.

^⑥ See Maurizio Cernusco, "Libya", in Hanak Mullered, *A European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p. 261.

^⑦ See Leonard S. Spector, *Going Nuclear*, Cambridge: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p. 148-149.

^⑧ See Lewis A. Duménil, *Controlling the Bomb: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52.

^(九) 参见胡光媛：《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和影响》，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4期，第16页。

放弃核计划

与南非一样,国际制裁和孤立——包括经济制裁、武器禁运、禁飞等外部压力对于利比亚作出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来说重要得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利比亚被视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而面临空前的国际孤立,并被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1986年1月,美国里根政府断绝了与利比亚的经济联系,并冻结了利比亚在美国的资产,开始对利比亚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制裁。1988年洛克比空难使利比亚陷入空前孤立。安理会于1992年对利比亚实行了广泛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所有航班出入利比亚。美国于1996年通过《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禁止美国公司与利比亚发生商业往来,对其石油工业产生了极大影响。¹利比亚称其经济因此蒙受了330亿美元的损失,而世界银行的数据也高达180亿美元。利比亚每日原油产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330万桶减少到2001年的140万桶。^④因此,对利比亚而言,寻求西方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摘掉“恐怖主义国家”或“无赖国家”的帽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在于可大大缓解并改善其经济状况,还可以缓解下文即将讨论的国内政治矛盾。事实上,1992~1999年,利比亚已开始为放弃核计划做了一些早期准备。

尽管如此,仍不能肯定地说,是外部压力导致了利比亚最终作出决定放弃核计划,因为在西方实施全面制裁前,卡扎菲就已经开始着力缓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1989年,利比亚加入了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利比亚与苏丹签署了一体化条约,并于1990年与埃及恢复了外交关系。而利比亚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停止了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并开始致力于解决地区争端,当时联合国的制裁尚未启动。^⑤所有这些表明,外部压力可能对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原因仍在于国内政治,尤其是卡扎菲个人身上。

(三) 在外部的沉重压力下,对国内政治的考量是否成为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肯定的。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根源在于利国内政策的变化;尤其应考虑到,卡扎菲是利比亚发展与放弃核计划的核心人物,因此维持其权力地位显然相当重要。

就发展核武器的目的而言,除宣称的外部威胁外,卡扎菲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维持政权也很重要。对卡扎菲而言,拥有核技术是阿拉伯成就的证明,是促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手段^{1/4};核武器被认为是强化利比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其反帝国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的工具体。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卡扎菲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要素,并被称做他的“原始价值观”(primordial value);^{1/2}利比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理人,而核武器则是建立强大的、可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一较高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工具。当然,通过证明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很大程度也可以帮助卡扎菲缓解其内部持续存在的军事政变压力,从而达到政权延续的目的。^{3/4}此外,尽管卡扎菲表达出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服务于稳固政权的目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卡扎菲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反对,事实上是为了深化内部革命、转移对国内金融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⑥

但可以认为,卡扎菲的这些目的遭到了现实的沉重打击。卡扎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并未受到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导致了它在阿拉伯国家

¹ 该法案于2001年到期时由布什总统批准延长5年,但事实上在利比亚宣布放弃核计划后已经停止对利比亚实施。

^④ Kenneth Katzman, "The Iran-Libya Sanctions Act (ILS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S20871, Updated August 8, 2006; Mary-Jane Dech, "Qadhafi's Changed Polic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iddle East Policy*, February 2000, p. 149.

^⑤ See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the United States—Two Centuries of Str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 163.

^{1/4} See Joseph Cirincione, Jon B. Wolfshohl and Miriam Rajkumar, *Deadly Arsenal—Track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p. 306; Leonard S. Spector, Mark G. McDonough, and Evan S. Medeiros, *Tracking Nuclear Proliferation—A Guide in Maps and Chart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5, p. 141.

^{1/2} See 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Ideology of Muammar al-Qadhafi: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No. 4, 1983, p. 473.

^{3/4} See Lillian Craig Harris, *Libya—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p. 91.

^⑥ See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Oil and State-Build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4–85.

中的孤立；而对发展经济的忽视及对输出革命的关注，使卡扎菲不得不面对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较大落差，而且使得国内不满情绪日益强烈。¹ 伊斯兰极端势力、军队、部落和意识形态等反对势力日益强大，而且伊斯兰主义者开始与军队结盟，形成反对卡扎菲的联盟，并于 1993 年发起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而 1996 年 6 月中旬的一次抗议活动甚至导致 50 人丧生。^④

正是在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下，卡扎菲不得不对其政策作出调整。20 世纪 80 年代末，卡扎菲决定在利比亚开始尝试推行自由化，称为“对外资开放政策”。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利比亚经过十年的酝酿，进行国内改革，以及出于商业目的，而试图重新与欧洲交好。卡扎菲从原先的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中走了出来，转向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市场和投资，这意味着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普遍行为规范。^④ 因此，作为对恶化的经济形势及其导致的国内动荡的反应，卡扎菲逐渐采取了实质性地有助于改变利比亚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两项重大决定，即接受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和放弃核计划。

结 束 语

学术界目前的研究重点和兴趣大都集中于核扩散，对于同样重大的放弃核计划却缺乏充分的研究。本文认为，展开这样的研究对于缓解、甚至彻底解决当前的核扩散困境的思考不无助益。对放弃核计划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案例分析，缺乏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框架。已有的尝试往往强调 4 个方面：安全、国内政治、规范及强制外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模式，即“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将这 4 个方面整合到一个综合的框架中对放弃核计划的现象加以理解。笔者认为，作为外部压力的安全威胁、规范影响及强制

外交对于放弃核计划的决策都并非是决定性的，最关键的仍是对国内政治的考量。但外部压力仍有其重要性，它可能促成导致国内政治考虑的因素产生，并最终促使一国放弃核计划。

对南非和利比亚的案例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无论南非还是利比亚，安全威胁在这两个国家发展或放弃核计划中都不占重要地位，或者说其安全事实上是有保障的，以安全作为借口不过是个幌子。但其他不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如规范、制裁、孤立等，却对放弃核计划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尽管这些外部压力的原始目标并非是发展核武器，如在南非是针对种族隔离制度，而在利比亚则针对该国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这些并不威胁一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对于国内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南非是使种族隔离制度难以继续，而在利比亚则对于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上升有所帮助，而正是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量，南非和利比亚最终都作出了弃核决定。

对于理解当前的核扩散危机、伊朗的核危机而言，本文的分析框架是有用的，尽管可能还需加以具体分析。伊朗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是有保障的，尽管可能它无法单独与美国抗衡，以安全作为核扩散的理由并不充分。当然，要缓解甚至彻底解决朝鲜、伊朗的核危机必须保证其安全需求。但在保证其安全需求的同时，也必须对它们保持足够的外部压力，促使它们原有的内部矛盾激化，并最终形成放弃核计划的内部动力。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贾丽华）

¹ See Ronald Bruce St. John, *op. cit.*, p. 6.

^④ *Ibid.*, p. 175.

^④ 转引自胡光媛：前引文，第 15 页。